

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 ——基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实证研究

祁新华, 朱 宇, 张抚秀, 林小阳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企业区位选择是理解城镇化内在机制的重要微观视角。应用西方区位因素分析框架, 探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区位选择背离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中倾向于选择位于或接近大城市的预期, 而呈现出以镇村行政区域为主以及“大分散, 小集中”的分布格局; 同时, 大多数企业没有过搬迁的经历, 或属于近距离搬迁且迁移至开发区或大中城市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调查结果, 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区位因素(运费、技术成本、交易成本、集聚经济、劳动力、土地成本、资本因素、个人因素等), 并揭示了导致该地区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微观机制, 验证与完善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

关键词: 工业区位理论; 区位因素; 就地城镇化;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0)02-220-09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历来是地理学研究的经典命题, 企业区位选择则是城镇空间结构的重要微观视角, 近年来国内地理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1-2], 为深入理解中国城镇化的内在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 运用企业区位的微观视角探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内在机理的成果却鲜见于有关报道中。因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尝试通过问卷调查, 将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企业的区位选择置于古典和现代工业区位理论的区位因素分析框架中, 探讨企业区位行为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城镇化效应, 希望通过本文的工作获得在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企业区位选择的新认识, 从而对相关区位理论与城市化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工业区位理论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一般空间法则。综观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历程, 区位因素分析始终贯穿其中, 而考虑经济活动中的成本因素是区位理论的传统思维, 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3]。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开创了工业区位理论的先河, 是后来诸多工业区位理论赖以发展的经典法则, 其中成本因素包括运费、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分散所带来的成本变化, 其最大的贡献是最小费用区位原则^[3-4]。帕兰德将不完全竞争概念引入区位

论研究中, 在提出远距离运费衰减规律的同时, 强调最佳的生产地区位是包括运费在内的所有生产费用(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总和最小化^[3-5]。胡佛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运输费用的修正与补充, 即充分考虑到运费的结构分析(运输费用的距离递减变化及场站作业费用)和不同的运输方式对交通运输费用的影响等^[3]。与以上学者考虑的角度不同, 以廖什为代表的利润(收入)最大化理论则从需求角度出发, 认为收入与成本差距最大的区位才是最佳的选择^[3], 并且重视关税、政治制度、烦琐的行政手续和贸易障碍等政策制度因素^[6]。以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帕兰德区位理论、胡佛区位理论、廖什区位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区位理论通常被称为古典工业区位理论, 其共同点是企业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最小费用)或利润最大化, 区位选择则偏好于人口密度大、收入水平高的大城市^[3], 并形成集聚发展态势。

西方古典工业区位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决策主体均为完全掌握环境信息, 具有正确决策能力的理性“经济人”。而在现实生活中, 一方面人类无法完全掌握所有信息, 另一方面并非有所的区位决策主体都追求成本(费用)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 而

收稿日期: ; 修订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RK007)、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J0830521)、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2009J05055)、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7B2013)和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祁新华(1974-), 男, 福建莆田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人居环境科学、城镇化研究。E-mail fjqxh74@163.com

通讯作者: 朱 宇, 研究员。E-mail zhuYu61@163.com

是追求某种满足^[3]。这些因素的加入使古典区位理论得到不断修正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现代工业区位论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也同时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比较典型的如行为区位理论中的史密斯区位收益性空间边界理论,充分考虑到决策者个人的偏好(如休闲娱乐设施、个人成就感)、居住地或出生地、决策模仿等,企业家有可能选择接近最佳区位且又能够满足自己行为的空间^[7];普雷德的行为区位理论强调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行为对区位选择的作用,并用行为矩阵来表示信息拥有水平和信息利用能力对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8]。除了考虑个人行为因素以外,近年来西方现代工业区位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6],主要是在传统要素与成本(如运费、劳动力、资本等)的基础上,将成本考虑范围拓展到技术成本(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等)^[9]、交易成本(寻找就业机会、寻找原材料、搜寻市场、雇佣劳动力、合同谈判、合同实施等)^[10]、信息成本等^[11]。在对这些成本权衡的基础上,企业区位选择的倾向仍然是技术人才集中、市场发展程度高、通讯设施发达的大中城市。

从以上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图1),尽管背景与角度各不相同,但西方古典与现代区位理论在空间取向上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

认为企业区位选择要么倾向于大中城市,要么接近最佳区位(接近大中城市)。那么,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区位选择是否也符合这个预期呢?事实上,即便是古典与现代西方工业区位理论都存在着立论依据、背景、考虑问题的范围的差异,因此希望西方工业区位理论能解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所有企业经济活动的区位现象是不现实的,必须结合现代企业新的区位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才有可能对客观经济活动区位现象有全面的了解^[3]。下文就以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为例,探讨这个问题。

1 数据来源与样本属性

1.1 数据来源

2009年8~9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选择城镇化比较发达的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与惠安县)、广东省东莞市、江苏省昆山市进行问卷调查,在每个县市首先随机抽取5个乡镇,再根据每个乡镇企业名录,通过电脑打乱排序后,按排名顺序等距随机抽样,每个镇抽取10个样本,共计200个样本。调查员与企业主进行访谈,并现场填写问卷调查表。

1.2 样本属性

样本具有以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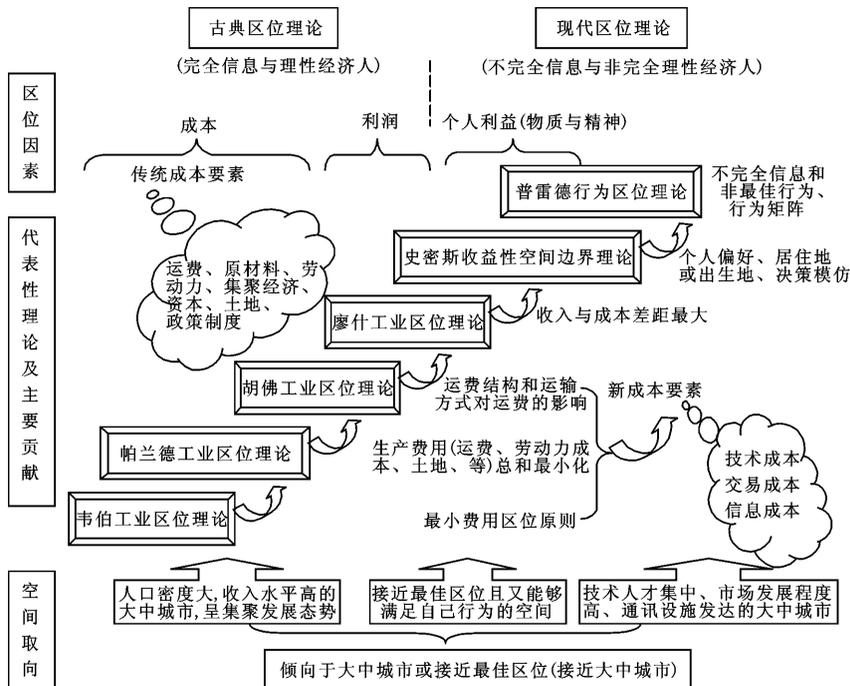


图1 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发展轨迹

Fig 1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western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1)企业性质:在接受调查的200家企业中,乡镇企业比例为48%,接近一半,可见中国东南沿海城镇化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经过长期发展与演变,仍然占据着企业数量的半壁江山。但是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昆山市与泉州市乡镇企业比例分别为60%与62%,而东莞仅为8%。

(2)企业所有制结构:84%为私营与个体企业(分别占39%和45%),股份制企业占8%,外资企业占7.5%(其中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与外商独资各占4.5%、1%和2%),集体所有制企业仅占0.5%。

(3)企业行业类型:接受调查对象绝大多数为制造加工企业,比例高达85.5%;其次为社会服务业,占8%,建筑业与批零贸易餐饮业各占2.5%;农业企业仅占1%。说明东南沿海地区依然是以制造加工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农业企业比例极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产业基本上已经非农转型的现实情况。

(4)企业规模结构:在企业创办初期,平均每个企业的职工总数不足45人。到2009年,平均每个企业的职工数(包括管理人员与工人)已接近

108人,但仍属于中小企业的规模。

(5)企业创办时间:95%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办的企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创办的企业就占了83.5%,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创办的企业仅占5%。

2 企业区位行为特征

2.1 企业现有区位

在所调查的200家企业中,68%(136家)位于城镇建成区和各级开发区,其中,位于乡镇级建成区和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的企业占62.5%,位于村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的企业占19.1%,而位于县市以上的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仅占18.4%;仅有32%(64家)位于城镇建成区和开发区以外(表1)。由此可见,已进入城镇建成区和各级开发区的企业大多位于村镇一级行政区。上述状况说明,调查地区的企业总体上已处于相对集中分布的态势,但大多数集中于级别较低的村镇一级行政区,呈现一种“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这种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是相互印证的^[12-13]。

表1 企业在城镇建成区与各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的分布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enterprises in built area and different level of development areas(industrial area investment area)

所在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类型	昆山市(%)	东莞市(%)	泉州市(%)	合计(%)
建成区(地级市)	8.3	0	0	0.7
建成区(县、县级市)	16.7	0	2.4	2.9
建成区(镇)	16.7	14.6	7.2	10.3
国家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	0	0	1.2	0.7
省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	8.3	0	1.2	1.5
地市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	0	2.4	2.4	2.2
乡镇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	50	24.4	83.1	62.5
村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	0	58.5	2.4	19.1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数量(个)	12	41	83	136

2.2 企业搬迁经历与方向

在所调查的200家企业中,149家(74.5%)企业创办后就没有搬迁过,有搬迁经历的企业仅51家(25.5%)。可见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空间沉淀特性”,一旦选择了初始区位后,因为“空间成本”较高而不容易迁移,这就是所谓的地理惯性^[6]。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在创办时的区位因素研究更应当受到重视。在上述51家有过搬迁经历的企业中,33.3%的企业迁往同一行政村(居委会)内的另一位置,43.1%的企业迁往同乡

(镇、区)内的另一行政村(居委会),15.7%的企业迁往同市(县)内的另一乡(镇、区)。这意味着92.2%的企业属于近距离搬迁,而仅有5.9%的企业迁往距离相对较远的另一市(县)。

2.3 企业区位选择意愿

当被问及“企业是否计划迁往大中城市”时,169家(84.5%)明确明示没有此计划,仅有31家(15.5%)的企业主表示如有可能将迁往大中城市。在64家位于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以外的企业中,当被问及“企业是否打算迁入城镇建成区

或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时,70.3%选择“否”,仅有不到30%的企业主愿意迁往城镇建成区与各级开发区。

综上所述,中国东南沿海所调查的3个地区企业区位行为呈现以下特征:目前企业主要位于镇村行政区域,且大多数没有过搬迁的经历;在有搬迁经历的企业中,绝大多数属于近距离搬迁;至于迁移意愿,多数企业不愿意或觉得没有必要迁移至开发区或大中城市。这种偏离于大中城市的企业区位选择事实上直接导致了我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发达的“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现象^[12 14-16],而这个现象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国际著名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Friedmann J认为这是中国过去25 a最不寻常的转变过程之一,并在他最近的专著中被多次引述^[17 18]。在2004年出版的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城市化工作组的专著和2006年国际人文地理学权威刊物《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的一篇综述文章中,中国的就地城镇化都被视为当今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证据之一^[19 20]。2007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公布的《2007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也专门以案例的形式报道了关于泉州市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初步研究^[21]。

以上分析引发了以下2个理论问题:首先,是哪些因素导致这些企业的区位选择异于西方工业区区位理论的预期?其次,这种企业区位选择导致的就地城镇化机制又是如何运行的?下文将应用前文述及的企业区位因素分析框架探讨这2个问题。

3 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

正如上文已经论及,西方工业区区位理论经过不断地发展已形成古典工业区区位理论与现代工业区区位理论,在企业区位选择上为本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传统的区位成本要素,如运费、劳动力、集聚经济、土地成本、资本因素、政策制度因素是企业区位选择必须考虑的因素,新成本要素如技术成本与交易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区位取向。同时,个人行为因素(如个人偏好)等对企业区位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分析中同样不能忽略。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以全面审视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区位选择

的微观机制。

3.1 运费

运费历来是企业区位分析中的首要因素。显然,运费与交通通讯条件、原料的来源密切相关。首先,发达的交通通讯能大大降低运费。在本次调查中,在回答“贵企业创办于该市/县的首要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时,34%的受访企业主选择“交通通讯便利”选项,远高于其他选项而位列第一。在各区域中,昆山市与泉州市的企业均将交通通讯便利作为企业创办的最主要条件。东莞市的比例相对较小,只有16.3%,但仍然位于所有选项中的第二位(表2)。可见,正是由于交通通讯网络发达,加上大量廉价便捷的交通工具(如摩托车、工具车等)的辅助,使运输成本与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企业距离市场和大中城市较远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被交通通讯的便利所克服,由此而导致企业区位选取于广大乡村地区^[12]。在调查中,绝大多数(96.5%)企业对目前的交通状况比较满意,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论证。

其次,企业获取原材料或零部件、产品销售、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也会影响运输费用。在回答“企业目前区位选址的便利程度”这一问题时,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在原材料或零部件获取、产品销售、信息获取等方面的方便程度很高,认为“还可以、比较方便与很方便”比例分别为94%、84.5%、87.5%。可见,总体而言,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为企业原材料获取、产品销售与信息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事实上大大降低了产品的运输费用。这些调查结果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是就地城镇化现象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的地理基础。

3.2 技术成本

在宏观的市场经济背景与有利的政策制度环境下,技术成本的作用可反映在企业能力的的作用上;尤其是在企业初创时,个人的能力可以直接降低技术成本,甚至对企业的创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能人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22]。本次调查显示,在企业创办的首要条件中,34%的人选择“一技之长”,位列第一。东莞市与泉州市的比例各42%和38%,均位列第二位。昆山市18%的企业主将个人的技能作为企业创办的首要条件,仅次于选择“闲散资金”人数而居第二(表3)。显然,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自身储备的

表 2 企业创办于本市/县的首要原因

Table 2 The first reason of enterprise established locally

原 因	昆山市 (%)	排序	东莞市 (%)	排序	泉州市 (%)	排序	合计 (%)	排序
没有能力在外地办企业	14	3	07.1	4	7.1	5		
国家政策限制无法办在城市	0		4.1		1		1.5	
企业为当地集体所有必须办在当地	2		0		2		1.5	
本地的水电等基础设施较好	10	5	8.2	4	5.1		7.1	5
本地交通通讯便利	36	1	16.3	2	41.8	1	34	1
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	16	2	8.2	4	15.3	2	13.7	3
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和土地条件	6		6.1		12.2	3	9.1	4
可充分利用当地优惠政策	2		2		0		1	
熟悉当地各种关系好办事	12	4	24.5	1	12.2	3	15.2	2
为发展家乡经济作贡献	0		12.2	3	0		3.0	
为光宗耀祖	0		0		1		0.5	
其他	2		18.4		2		6.1	
合计 (%)	100		100		100		100	
数量 (个)	50		49		98		197	

表 3 企业创办的首要条件

Table 3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to establish enterprise

条 件	昆山市 (%)	排序	东莞市 (%)	排序	泉州市 (%)	排序	合计 (%)	排序
闲散资金	36	1	18	2	20	2	23.5	2
外来投资	6	5	8	4	6	4	6.5	5
空闲房屋或土地	4		2		4		3.5	
剩余劳动力	4		8	4	5		5.5	
本地资源	14	3	14	3	6		10	3
一技之长	18	2	42	1	38	1	34	1
经商传统	4		2		4	4	3.5	
市场需求	12	4	4		12	3	10	3
国家政策允许和鼓励创办企业	0		0		4		2	
地方政府鼓励与扶持创办企业	0		2.0		0		0.5	
其他	2		0		1		1.0	
合计 (%)	100		100		100		100	
数量 (个)	50		50		100		200	

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促成其就地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传统工业区位理论对这方面的潜力显然估计不足。

调查同时发现,这些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便利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技术成本的限制。调查发现,大部分(75.5%)对企业获取人才方面的便利程度比较满意,东莞的企业主对目前区位在吸引人才方面不满意的比例稍高一些(40%)。这种状况与就地城镇化地区分散式的城镇化所形成的人居环境条件较差有密切的联系。近年来,这些地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东莞开始营造适宜居住与创业的人居环境,以吸引高层次人才^[13]。

3.3 交易成本

由于中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太完善,为了节约企业“隐性”成本,是否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拥有

良好的人脉关系对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至关重要。在回答“贵企业创办于该市/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时,“熟悉当地各种关系好办事”位列第二,选择此选项的企业主占15.2%。同时,“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位列第三,选择此选项的企业主占13.7%,昆山市与泉州市的比例分别16%和15.3%,仅次于“交通条件”而位居第二(表1)。同样是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一些企业宁可选择乡村地区而不准备迁入城镇建成区或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基于这一原因而觉得没必要从乡村地区迁入城镇建成区或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的企业占15.5%。显然,这种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导致选择企业监管相对松散农村地区的现象在这些地区是屡见不鲜^[12 13],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就地城镇化产生于广大乡村地区。

3.4 集聚经济

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23]。受调查企业大多数为中小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中注重的集聚因素在就地城镇化地区不起作用。如前所述,在所调查的200家企业中,位于城镇建成区和各级开发区有136家,占68%,位于城镇建成区和各级开发区以外的占32%。但与前面分析的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交通因素的特点相适应,这种空间集聚的空间尺度主要在镇村一级,在136家企业中,位于乡镇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的企业占62.5%,位于村级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的企业占19.1%,而位于县市以上开发区(工业区、投资区)仅占18.4%。在东莞与泉州位于镇村开发区的企业比例更是高达82.9%和85.5%(表1)。这种“大分散,小集中”空间格局既体现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中集聚经济的作用,又受到就地城镇化地区特有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与西方传统企业集聚模式不同的特点。

3.5 土地成本

在被问及影响企业创办时区位选择的首要原因时,仅有9.1%的企业主选择“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等条件”这一选项(见表2)。然而这并不表明,在就地城镇化地区,土地并不构成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各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往往低价出让土地,加上土地管理的漏洞,对违法用地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土地成本相对于其他成本而言反而位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事实上,本次调查中土地成本因素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厂房的来源上,尤其是企业初创时厂房的来源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相当大。这与资金与劳动力因素的分析一起,验证了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创办时充分利用“三闲”(闲置房屋、闲散资金与闲余劳动力)的客观事实^[12]。调查中,在回答企业创办时的厂址与办公场所的来源时,49.5%的创办者利用自家的房屋或本行政村、本乡镇以及其他乡镇或家庭的房屋或公共建筑物。可见,一半企业左右的企业创办时利用自家或集体的闲置房屋作为经营场所,以此来降低企业的成本。这也是导致相当多的企业在乡村创办,进而启动了就地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土地这一因素的作用并不反常,还

是符合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分析框架。

3.6 劳动力

劳动力成本历来是西方工业区位理论考虑的重点之一。尽管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5.5%的企业主认为剩余劳动力是创办企业的首要条件(见表3),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要素对企业区位选择不重要。相反,劳动力成本仍然在起作用,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人口密集,在其发展初期本身能提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在上文已说明企业大多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此时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问题反而不被重视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产业类型的选择已充分顾及劳动力这一要素,各区域产业结构及其对劳动力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力因素的作用。此次被调查企业基本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其主要产业类型为石材加工、服装鞋帽、模具机械/电子产品加工制造、针织/绣花/毛织加工等行业。这些产业的选择显然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供给充足这一优势。同时,此类产业对技术与学历的要求不高,44.5%的企业对一线工人受教育水平没有任何要求,要求具有初中与小学学历则占39.5%。这种学历要求进一步降低了当地居民进入企业的门槛,也为大量的流动人口的涌入就业创造了必要条件。

可见,当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构成的丰富劳动力资源事实上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这与西方国家将劳动力成本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中国的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在广大乡村地区就可以大量地获取廉价劳动力,加上恰当的产业类型的选择,企业迁入大中城市以获取劳动力的必要性自然大大降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口密度是就地城镇化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的地理基础。

3.7 资金因素

在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资金来源的就地性在企业区位选择时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下面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在调查中,在回答“企业创办的首要条件”这一问题时,选择“闲散资金”的企业主占23.5%,仅次于位居第一位的“一技之长”;在昆山市更有36%的企业强调闲散资金的重要性,其重要性位居第一(见表3)。与此同时,在

受访企业的资金构成中,来自“参与创建该企业的个人或者家庭”比重最大,为 58%;银行贷款、外商投资、政府投资的比重均很小,分别只占了 9.5%、4.5%、2.5%,而海外侨汇更小,仅占 0.5%。各区域的情况有一定的差异,东莞个人或家庭的资金比例高达 80%,泉州市接近 60%,而在昆山仅 34%,这可能与昆山集体经济相对发达的事实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创办时民间借贷的比例相当高(24.5%)。昆山市的“民间借贷”更是高达 32%,反映了这些地区商业网络与民间互助系统的发达程度,这也是就地城镇化地区企业创办时克服资金瓶颈的另一个重要途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企业创办时银行贷款渠道并不十分畅通,政府投资的力度很小,外商投资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侨汇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这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说明,就地城镇化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乡村自身的力量。这种资金来源的“乡村性”显然是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选择乡村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乡村社区内部自有资金在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创办时所起的关键作用。这种现象是西方工业区位理论所不能涵盖的。

3.8 个人行为因素

西方工业区位因素分析框架中,区位因素不仅包含有可用货币度量的价值标准,也包含不能用货币测算的非经济因素^[3]。现代企业在区位选择时经常出现古典区位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区位偏离现象^[7],行为区位理论中个人行为偏好对企业区位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本次调查结果中,如一部分企业主创办企业是出于个造福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在回答“企业创办的目的”这一问题时,回答“为后代留下点家业”的占 20.5%,位列第一。还有些企业家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选择“为创建者家庭或当地居民增加收入”与“为创建者家庭或当地居民剩余劳力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主各占 14% 和 11%,分列第二位与第三位。正是出于造福家庭成员和当地居民个人行为偏好,部分企业家在企业区位选择时往往倾向于家乡,由此推动了就地城镇化的产生与发展。

由可上分析可知,西方工业区位因素分析框架中的运费、技术、交易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资本因素、个人因素同样作用于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且在企业的区位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作用力的方向与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

预期有所差异,不是趋于大中城市,却是分散于广大乡村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政策制度因素,西方工业区位理论通常认为政府制定的制度与政策(如改善区位条件、增加区位补助金和区位限制条件等)也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3],但在调查地区,政策制度的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在企业创办的主要条件中,选择“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允许和鼓励创办企业”的仅占 2%(见表 2)。在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条件中,选择“可充分利用当地优惠政策”也只占 1%(见表 3)。可能是由于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企业(83.5%)创办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之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已惠及大多数地区,各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不象改革开放之初那么显著,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所享受的政策优势并不突出,因而对企业创办的影响也逐步削弱。与此同时,上述调查结果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就地城镇并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

4 结论与讨论

(1)本次调查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总体上呈现以下特征:乡镇企业依然占据着半壁江山;个体与私营企业取代集体所有制企业成为主体,并开始与外资有机融合在一起;企业主要以制造加工业为主;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多数企业创办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

区位选择具有以下特征:主要位于镇村行政区域,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分布格局;大多数企业没有搬迁的经历,在少数有搬迁经历的企业中,大都属于近距离搬迁;至于迁移意愿,多数企业不愿意或觉得没有必要迁移至开发区或大中城市。这与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中企业区位选择倾向于选择位于或接近大城市的预期截然不同。

(2)本次调查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区位选择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运费、技术成本、交易成本、集聚经济、劳动力、土地成本、资本因素(本地资本)、个人行为因素等西方工业区位理论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而政策制度以及外商投资等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3)对企业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与西方工业区位选择不同的是,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不必进入大城市同样能够达到成本最小化或利润

最大化的目的,企业区位选择以聚落体系中低等级的镇村行政区域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区位论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在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不起作用,相反,区位因素分析框架对理解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区位行为很有帮助。

事实上,问卷调查中关于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结果表明,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同样是基于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考虑到了大部分传统和现代区位论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的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及由形成的特征都是在特定的地理历史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的区位选择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预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界限淡化所导致的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区位选择微观地理基础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的乡村地域同样拥有发达的交通条件、充足和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较低的交易成本,从而满足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条件。

(4)上述异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企业区位选择的微观地理基础是就地城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从理论上分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广泛分布于乡村地区并不违背西方企业区位理论,只是各区位因素所涵盖的内容及作用的强度与方向有所不同,由此而导致企业区位选择方向差异,它显然是对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验证与完善,是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今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经验事实。

参考文献:

[1] 樊杰,王宏远,陶岸君,等.工业企业区位与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分析——洛阳市大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案例剖析[J].地理学报,2009,64(2):131~141

[2] 吕卫国,陈雯.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2009,64(2):142~152

[3] 李小建,李国平,曾刚,等.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 Weber A. Über d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n[M]. Enster Tell Reine Theorie des Standorts Tübingen Mohr 1909

[5] 刘继生,张文奎,张文忠.区位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1~14

[6] 李杰.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江汉论坛,2008(8):40~43

[7] Smith D M. Industrial Location: 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Analysi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1

[8] Pred A. Behaviour and Location Foundations for a Geographic and Dynamic Location Theory (I) [M]. Lund C. W. K. Gleerup, 1967

[9] John H D, Sum à K K.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hotel industry - Some findings from a field study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5, 35 (2): 101, 133.

[10] Caves R 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J]. Economics 1971, 38(141): 1-27

[11] Mariotti S, Piscitello L. Information costs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within the Host 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al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 4 815- 836.

[12] Zhu Y. In situ urb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Fujian Province [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0 31(2): 413- 434

[13] Lin George C S. 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 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 47(1): 28- 53

[14] Zhu Y. New Paths to Urbanisation in China Seeking More Balanced Patterns [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9.

[15] Zhu Y. Beyond large-city-centred urbanisation: in situ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J]. Asia Pacific Viewpoint 2002 43(1): 9- 22

[16] Zhu Y. Changing urbanization processes and in situ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China's settlement definitions [C]. //Champion A, Hugo G. 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 Aldershot Ashgate 2004: 207- 208

[17] Friedmann J. The Prospect of Cities [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18] Friedmann J.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19] Champion T, Hugo G J. New Forms of Urbanisation: 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M]. Aldershot: Ashgate, 2004

[20] Hugo G. Population geograph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J]. 2006, 30(4): 513- 523

[21] Zhu Y, Qi X H. Case Study: Peri-urbanization in Quanzhou Municipali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A]. I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7: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 [C]. New York 2007

[22] 宋林飞. 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 [J]. 新华文摘, 2009, (7): 28~30

[23] 李郁,丁行政.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J]. 地理科学, 2007, 27 (5): 636~ 64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Location and Its Urbanization Effect

—A Case of Coastal Areas in Southeast of China

QIXin-hua, ZHUYu, ZHANGFu-xiu, LINXiao-ya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location selection is the important micro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location and its urbanization effect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 of western location factors.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enterprise location deviated from the western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anticipation of being located or approaching to the metropolis. On the contrary, the enterprises mainly center around towns or counties and with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cattering around large scale areas and concentrating on small scale areas”.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enterprises never relocated or only moved with in short distance. If they want to relocate, their intention of moving to development areas or medium and large cities is not very strong. The influencing location factor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technological cost, transactional cost,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labour cost, land cost, capital and private factors were examined, which resulted in the phenomenon of in situ urbanization in coastal areas in Southeast of China. The article testifies and perfects the western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Key words western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location factors; in situ urbanization; coastal areas in Southeast of China